

欧洲简史

拿破仑以后

〔美〕罗杰·劳·威廉斯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欧 洲 简 史

拿 破 仑 以 后

〔美〕 罗杰·劳·威廉斯著

吉林师大历史系翻译组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A
SHORT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NAPOLEON

BY
ROGER L. WILLIAMS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1972

根据约翰·威利和桑思出版公司1972年版译出

内部读物

欧洲简史

拿破仑以后

〔美〕 罗杰·劳·威廉斯著
吉林师大历史系翻译组译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5年5月第1版 197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1091·24 定价: 1.15元

出 版 说 明

本书作者罗杰·劳伦斯·威廉斯，在美国怀俄明大学历史系任教。本书是作者所著欧洲史著作之一。

作者从其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出发，以其“特殊的编写体例”和“别具一格”的结构布局，按其所需地概述了1815年以来（即所谓“拿破仑以后”）的欧洲历史。

全书贯串着一条历史唯心主义的黑线。作者在论述这一时期欧洲许多重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时，只谈这些事件的本身，而不谈它们赖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即物质经济生活条件；只谈少数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如拿破仑、梅特涅、俾斯麦等人的活动情况，而不谈人类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这就掩盖了这一时期欧洲社会由资本主义替代封建主义，尤其是到了二十

世纪初叶开始部分地由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发展的真象，掩盖了这一时期欧洲社会阶级斗争的实质。

在本书中作者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偏见是十分露骨的。他对于资产阶级的一切——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及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几乎总是给予肯定、称赞、美化。例如，作者至今还津津乐道他们的祖先所谓为人类谋求“自由、平等、博爱”这个极其虚伪的口号；尤其是作者在为美帝国主义涂脂抹粉方面大卖力气。但与此相反，他对无产阶级的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以及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则莫不加以否定、歪曲、丑化。例如，作者诬蔑巴黎公社、曲解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作者在攻击列宁、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斯大林个人方面，不遗余力。这就混淆了欧洲这一时期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和斗争中的历史的是非界限。

从本书中可以看到，作者对这一时期欧洲历史的发展规律是搞不清楚也不可能搞清楚的。因此，作者对于人类未来的判断，陷于无可奈何的

矛盾状态：他一面相信人类（应为“资产阶级”）会有“更美好的生活”亦即“更自由的生活”；一面担心害怕“原子爆炸”和“人口膨胀”可能招致人类毁灭的灾祸——诚然，作为一个垂死的阶级的代言人，这样的预感是合乎逻辑的。

本书是根据约翰·威利和桑思出版公司1972年版译出的。

1975年4月

前 言

这是一本从1815年开始到现在为止的欧洲简史，其篇幅约为按惯例编写的同类史书内容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有很多细节不得不予以略去。但是这种特殊的编写体例，既有助于阅读各种补充读物，又给我们提供了机会，以便从另一途径去探讨这一时期的历史，并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作出不同的论断。本书旨在供初入高等院校的学生兼供一般读者使用。

本书别具一格，在其他方面也与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常规惯例有所不同。本书将欧洲视为一个整体，以此作为本书结构的重点，读者所看到的并不是国别史的汇编。本书虽然具有必要的编年史体例，但其突出的特点是对1815年以来这一历史时期的概述。所以，本书在某些方面看来颇似一篇内容扩大的论文，其中提出几个论点并加以阐述。有四个主要的论点，实际上是本书的

章节标题：（1）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对立的主张；（2）中央集权化的日益加强；（3）欧洲社会的民主化；（4）两类文化（文学和科学）的状况。但是还有第五个论点——良心的危机（信仰或不信仰）和现有宗教的命运——贯串于19世纪和20世纪历史的叙述之中。

罗杰·劳伦斯·威廉斯
于怀俄明州，拉腊米

目 录

第一编 绪 论

科学和技术的革命	(4)
自由主义运动和人道主义运动	(9)
法国革命的时代	(16)
拿破仑的年代	(27)

第二编 一百年(1814—1914年)

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对立的主张	(33)
1. 1814—1815年的解决方案	(33)
2. 维护解决方案 (1815—1848年):	
梅特涅时代	(42)
3. 1848年: 革命的一年和	
梅特涅时代的结束	(57)
4. 取代维也纳解决方案 (1851—1871年):	
拿破仑三世处于优势地位	(69)
5. 通向全面战争之路 (1871—1914年):	
德帝国的称霸	(86)

中央集权化的日益加强	(109)
1. 法国革命的和拿破仑的遗产	(109)
2. 自由主义制度和急进主义兴起	(114)
3. 1848年的余波	(127)
4. 巴黎公社(1871年)	(132)
19世纪的两类文化	(135)
1. 欧洲社会的民主化	(135)
2. 科学技术的威力	(144)
3. 对机械论和唯物论的抗议	(159)
4. 对暴力的感想	(181)

第三编 1914—1945年德国的历次战争

头几次较量	(194)
1.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4)
2. 俄国革命	(207)
3. 战后解决方案	(219)
4. 凡尔赛以后的政治气候	(224)
不平静的和平	(229)
1. 国际联盟	(229)
2. 和平解决方案的初步改变	(231)
3. 战债与赔款	(237)
4. 各分离国家	(241)
几个突出的独裁制	(248)
1. 法西斯意大利	(248)

2. 第三帝国	(255)
3. 苏联	(264)
4. 法西斯西班牙	(268)
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	(275)
1. 法国的分裂	(275)
2. 英国经济的不景气	(277)
3. 绥靖的年代	(279)
第二次世界大战	(290)
1. 意大利—德国的攻势	(290)
2. 美国参战	(296)
3.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304)

第四编 结论：1945 年以来的欧洲

从热战到冷战	(311)
1. 一个世界的思想	(311)
2. 欧洲的政治改组	(313)
3. 从放任主义到社会福利	(322)
两类文化的状况	(331)
1. 科学	(331)
2. 文学	(336)
索引	(346)

第一编 绪 论

19世纪和20世纪以及直到我们今天的欧洲历史，有其一致性，这是可以理解的。世间生活应该更合乎人情，诚然也能够使世间生活更合乎人情，这是18世纪有头脑的欧洲人共同的理想，如果我们首先承认这一点的话，那么这种一致性就清楚了。上述共同的理想极为重要，但如果我们要是认为18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潮达到高峰而转变对法国革命理想的热爱，并且与同一世纪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关系的话，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运动和革新就是预示每个人有更美好的生活，而更美好的生活也就是更自由的生活。有的人走得更远，甚至提出每个人都应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评论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生活的人，有一个准绳，以更美好的生活这个标准作为他们评论的

根据。就是说，不论欧洲哪个国家或哪个机构被认为不能缔造自由和幸福的，就必须受到社会的严厉谴责；如果那些当权者不赞成进步的话，法国革命的实例就会启发人们采取暴烈的手段来创造进步。评论这两个世纪欧洲生活的人，也有另一个准绳，对于欧洲人的新理想和进步的可能性，发生疑问。难道将来的生活在日益扩大的政治自由、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舒适的掩饰下，虚有其表，继续地困苦如昔吗？欧洲人把他们从前所关心的修来世，作为过时的东西抛弃了，而赞成今生今世立即得救，从长远来看，这对欧洲人将意味着什么呢？在欧洲一从拿破仑时代起，对于这样的问题从来没有比今天更为明确的答案；但是，若不是目前欧洲刚刚能够提出欧洲文明分裂为两类（对立的）文化，那么这种答案就会从那时到今天一直摆在知识界各战线的面前。

不论我们对这个结果如何判断，我们必须承认，18世纪的思想家和改革家不但希望人类美好，也相信人类的理智用得恰如其分，就能够实现这种幸福。他们有许多人，按艾萨克·牛顿爵

士（1642—1727年）的精神，认为上帝的世界是理想的结构，从而容易用理性分析。由此可见，用人类的理智根据理性解决世间问题，就是遵循上帝的箴规。这种观念甚至在那些洞悉人类的困窘、历史上根深蒂固的人事的罪恶和倒行逆施的人中间，在理智上也引起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

科学和技术的革命

现在关于近代科学和技术的功过的辩论，不过是欧洲历史上相持已久的争论最新的翻版而已。中世纪有科学之说仍然可以成立，虽然普遍流行着与此相反的种种臆说。其实，从近代科学的初期16世纪和17世纪起，科学的精神就已经是人道主义的，而且愈益致力于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而中世纪科学在探索过程中则多半是形而上学的。因此，中世纪学者发现：亚理斯多德对物质运动的解释，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生来必须要追求上帝。同样，亚理斯多德的重力学说需要以地球作为宇宙的中心，是和中世纪把地球当作人们寻求得救的场所的神学观点一脉相通的。当我们研究法 弗 西 斯·培 根（1561—1626年）和 雷 内·笛 卡 儿（1596—1650年）这些人物时，我们就会发现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培根写道：“现在科学真正的与合法的目标不外是：应该赋予人类生

活以新的发现和力量。”笛卡儿甚至对这一目标提得更明确，他说，知识应有益于生活，因而我们可以“使我们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

这种新的科学观点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生活的世俗化伴随着中古时期的逐渐衰落而日益加强。每一代人是这一逐渐世俗化的目击者，察觉到欧洲世界正在多方面发生深刻变化而感到不安。难道追求神权最终会意味着人类中止追求神吗？果真如此，难道人类竟因欲望过奢而招致悲惨的结局吗？然而，即使16世纪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也不能遏制生活的逐渐世俗化；因此，到18世纪，虽然许多人（包括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还保持宗教的虔诚和对上帝的信仰，但是世俗的事务仍然越来越多地浮现于脑际。由19世纪的一个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年）最后宣布了世俗化的合乎逻辑的结论：“上帝死了。”

一个近代科学家，例如牛顿，其学究气味或哲学家派头实在太浓厚了，而不关心自己的各种想法是否有用处，正在世俗化的社会在他的这些想法中发现了技术进步的可能性。欧洲各国中英国是第一个证明由于农业、医疗和工业的革新



而能够惊人地改善生活状况的国家，因此它是欧洲其他国家的楷模。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英国的实例之所以更重要，在于它使欧洲思想家看清了下述一个事实，即英国革新的能力，是和它至18世纪已经发展的政治稳定及更自由的政治制度分不开的。一方面，在重视精神事物并且对精神活动提供更自由的气氛的社会中，革新也更有可能。而在另一方面，政治稳定提高一般公众的信赖和减少投资的危险性，就是指利率会降低——一切希望技术进步的社会都必须得到投资的资本。

18世纪英国议会通过几百条圈地法令，逐渐废除中古农业的开放田圃制。圈地就是个人领有的耕地、庄稼和家畜只由所有者支配，而不由村社支配。圈地使投资于科学的农业及大规模的粮食生产成为可能；这就是对18世纪圈地从道义上和经济上进行的辩护。统计这种科学的大规模的农业的结果，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例如，18世纪后半期，市场上畜肉的平均销售量大约增加了一倍），也就是说，英国人口有了相当多的食品供应。但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农村人失去了他们在农村独立生活的资料；有些人在大农场找到工